

对纪录片解说词的批判话语分析

——以德国纪录片《知识就是力量——中国新精英》为例

王伟平

摘要:旨在运用批判话语分析方法,从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层面,来解析纪录片《知识就是力量——中国新精英》解说词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和模式固见。

关键词:纪录片;批判话语分析;话语实践;社会文化实践

作者简介:王伟平,女,主任编辑。(浙江卫视节目中心,浙江 杭州,310005)

中图分类号: I2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0) 05-0025-03

话语 (discourse) 是人基于词语、语句和篇章的个体语言表达,它带有言说主体鲜明的观念、立场和视角,并且表现出一定语境下的权力关系。福柯认为话语即“以主体为载体的权力机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行为模式、价值标准以及技术、不同认知类型和典型范式之间的不对等关系”^①。纪录片是由影像、音乐、解说词、同期声、剪辑等多种元素构成的文本,它与其他文本一样,往往渗透着基于一定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下的意图和主张,并采用编织话语的方式来达到重构现实、影响观众和行使话语权力的目的。无论社会政治形态、文化价值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如何,纪录片都会表达出某种意识形态和话语关系。

2006年在德国 Arte 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名为《知识就是力量——中国新精英》^② (下称《中国新精英》) 的纪录片,影片以清华、复旦两所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为背景,表现了中国精英阶层的形成过程。这部纪录片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上,采用自我价值标准,以居高临下的身体姿势,对中国教育制度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向德国观众传达了中国精英阶层形成与成长的部分真实信息,但也在客观上起到了误读和误导他者价值的作用和效果。

本文尝试用批判话语分析 (CDA) 和传播语用学的方法,细读部分解说词的形式和内容,解读其主体话语 (即话语实践) 建构特点,并挖掘其背后蕴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诱因 (即社会文化实践),从而达到揭示文本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的目的。

—

(a) 00:09—00:43 (时码): 中国追上来了! 中国会在十年后超越欧洲。中国让人恐惧。中国精英们想战胜对手,而且想学会战胜对手。这条龙准备着向西方刮起暴风雨。

(b) 07:50—08:24 (时码): 知识产权的转移是欧洲最大的风险,因为人们必须得忧虑来自中国人的竞争。

(c) 42:06—42:38 (时码): 中国已经在短短几年之内从发展中国家一跃而升为经济强国。中国最重

① 参见 Michel Foucault, *Archäologie des Wissens*,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 M. 1997 (1969), S. 68.

② 导演: Hauner, Andrea/Bardhele, Peter, 于 2006 年 2 月 1 日在德国电视台 Arte 首映。

要的品质就是对知识的渴求,通过知识成为世界大国^①。

瑞士社会学家乌里·文第绪(Uli Windisch)认为,如何选择和使用媒体传播词汇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某种话语策略,即说话人的主观立场以及权力关系。^② 我们可以在解说词a)中看出这部纪录片所表现出来的权力话语。首先,这些语句以混沌、阴霾的天色为背景,在上海浦东新区一组快节奏画面和急促的音乐渲染中,强烈地表达了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否定性观点。“中国追上来了!”(China kommt!)蕴含着“恐惧”和“怀疑”的意思,似乎中国的发展将会向西方“刮起暴风雨”;“中国让人恐惧”(China macht Angst)则毫无遮掩地说出影片的立场。而中国所谓的精英大学正是在为这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准备无往而不胜的“好斗”战士。在这里,中国和中国大学生则被定位为危险的竞争对手、充满威胁的敌人。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系列的贬义隐喻,如:“中国追上来了!”隐喻着成吉思汗横扫欧洲的历史情境,“暴风雨”隐喻着威胁或者灾难。

批判话语分析基本理论告诉我们,话语不能只研究某一个言说个体或者某一个社会群体,而是应该研究话语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语境。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些解说词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部纪录片表达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偏执,而这种偏执是在历史语境中生成和发展出来的“模式固见”(Stereotype),即“某一社会群体或其具体成员的语言表述,是他们的对本群体成员的观念认同,并具有判断的逻辑形式。它将某些特性和行为方式以不公平、简单化、笼统化的方式强加于另一社会群体,并带有评判性的感情色彩”^③。

电视纪录片是具有高度传播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形式,它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虚假的传播导致舆论误导和舆论操纵,任何社会政治形态下的媒体形式都是如此。在解说词b)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精英》解说词话语策略中的主观臆断性,也就是说,影片解说词的陈述已经预设了以下前提:1. 知识产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中国;2. 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掌握是欧洲最大的风险所在;3. 通过获取知识产权,来自中国的竞争将变得更加危险。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影片也没有案例证明其预设,因此这种语义预设是一个完全脱离了语境和生成关系的空洞概念。此外,这种预设同样建筑在“模式固见”的话语基础之上,也就是以某一社会群体的价值、期望值、观念出发构建一种“不公正、简单化、笼统化”的判断,并将其作为“一致认同的、熟悉的某些个性特征”强置于“他者”身上。

二

(d) 01:00—01:36(时码):谁想在中国上大学,就得拼命。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得到机会。失败意味着让家人失望并埋葬自己的事业梦想。

(e) 35:00—36:03(时码):在爱情这个话题上,中国的大学是禁欲的堡垒。恋爱关系不被期待。怀孕被禁止。谁要是不遵守,则必须离开。

(f) 37:10—37:53(时码):比起恋爱自由更棘手的问题是言论自由。在大学的书报亭里只有中文报刊。所有的报刊都经过了审查。

批判话语分析有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从语言行为中揭示文本的权力话语机制。我们从“模式固见”机理中可以看出,话语霸权常常蕴含在某一社会群体基于本群体共同认可的价值和行为特征所做出普遍性、概括性表述之中,以引起本群体成员不加反思地对此做出简单的认同。解说词d)就是一个例证。在欧美各国,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较为发达,民众受教育机会较为平等,因此教育竞争相对平缓,即便如此,

① 纪录片《知识就是力量——中国新精英》解说词,作者译,下同。

② Windisch, Uli. 1993. Der verbale Kommunikation. Die konfliktäre Kommunikation am Beispiel von Leserbriefen. 转引自: Bonfadelli, Heinz. Medieninhaltsforschung. Grundlagen, Methoden, Anwendung. Konstanz: UVK Verlagsgesellschaft GmbH, 2002, 138.

③ Uta Quasthoff: Linguistic Prejudice/Stereotypes. In: Sociolinguistics/ Soziallinguistik, Berlin: 1987, S. 785.

在欧美许多国家仍然存在教育不公平现象。中国的高考制度虽然存在一定的弊病，但它在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仍然不失为保证教育公平的一个难以摒弃的机制。如果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差异视而不见，以自身标准衡量他者，势必导致话语霸权。解说词 d) 将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作为“上大学”的普遍现象，将没有进入这两所大学的都视为“失败”，以此表达对中国社会非民主化的批评，其中“拼命”、“埋葬事业梦想”等词语则强烈地显示出这部纪录片单向度的价值观。

建筑在这种价值观之上的权力话语还表现在解说词 e) 和 f) 上，比如在“恋爱”和“言论自由”等话题上，《中国新精英》不仅仅将自我价值观普适化，即将此文化群体的“恋爱”方式以及“言论”方式视为标准，而且还表现出一种“无知者无畏”的盲目认知态度，因为无论是这部纪录片的画面，还是解说词都选择了其自身的立场，把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描述成“禁欲的堡垒”，而没有关注陌生视角和陌生语言行为，即没有关注中国大学生的恋爱观、恋爱状态和恋爱方式，也没有深入了解和调研中国大学生的言论现实和参政方式。这样的话语机制如同福柯所说的那样，话语绝不仅仅是交往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一种“独断的、权力的和历史的结构”。^①

三

上述解说词为批判话语分析提出了两个互为交叉的问题：首先是我们如何在“话语实践”层面上探究其话语本质，其次是如何在“社会文化实践”层面上探究其历史文化诱因。这里的“话语实践”是指纪录片的语言规则和知识系统，“社会文化实践”是指形成这些规则和知识的社会政治以及历史背景。

话语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知识系统”以及确定这些“知识”的主体或机构，纪录片的话语实践也是如此。这里所说的“知识”也就是福柯《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主体所占有的话语空间或者话语权力^②，因为话语不仅使用符号以确指事物，更重要的是创造对象本身。在这个“知识场域”中，主体按照自己的经验和意志建立言说规则，并确定和谈论自己话语体系中所涉及的对象。因此，《中国新精英》解说词出现的“爱情”、“自由”、“精英”、“机会”、“失败”等词语都必然地在一定的知识场域中得到价值定位。

我们发现，福柯的这种“知识”恰恰通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蕴含在这部纪录片片名之中，因为这部纪录片取名《知识就是力量——中国新精英》，一方面是为了讽刺和批评中国对于知识的盲目追求，批评中国的大国梦想，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部纪录片自身对于“知识”的垄断渴望。换句话说，它在批判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口号的同时，践行了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并且是以主体话语空间占有者的身份在运用“知识”。

与话语实践必不可分的是纪录片《中国新精英》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实践。它是主体得以产生话语、知识和权力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前提，这种前提的产生取决于西方历史发展的特殊语境，如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殖民历史等等。纪然，纪录片《中国新精英》的话语实践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方观众群中不会招到显性的批评和质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完全符合这一观众群的传播期待。换句话说，它的知识场域基本满足了西方社会价值标准和模式固见，或者说满足了某种偏见，即满足了对某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消极、贬毁性的观念，这种贬义性的“模式固见”常常带有情感和固执的特点。由于《中国新精英》所表达的这种话语实践满足了西方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观念、立场和理性判断，即便它带有明显的谬误性，在传播过程中也很难得到匡正。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任何纪录片都是意识形态的反映，都带有其特殊的话语特征，它既无法摆脱社会文化实践对话语实践的限定，也不能中立地陈述某一社会和历史现象，因为陈述本身就是立场、观点和价值的表现。纪录片应该淡化或者避免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尽可能地减弱贬义性“模式固见”的影响以及常常由此而产生的话语霸权。

① Michel Foucault, Arch? ologie des Wissens,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 M. 1997 (1969), S. 68.

② 参见刘壮成：《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9页。